

哲学向诗学习什么？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思潮反思

任 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862(2008)12-0067-08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西方哲学从古典向现代迈进以及文学艺术向现代主义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浩大的哲学与诗融合的浪潮。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相互融通、借鉴，共同对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和推进，其影响波及至今，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一

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在欧洲的浪漫主义是哲学与诗融合的先声，这股融合浪潮在19世纪后期开始形成规模，延续至20世纪，直至西方后现代主义兴起。在哲学上，与诗密切相关的派别主要集中在以人的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哲学思潮中，这类哲学把关注人的生存和探求生命意义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反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传统，强调“非理性”在人类思维中的价值，认为诗能够超越理性，对现代社会和人心具有救赎意义。其中主要包括：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时间“绵延”理论、克罗齐的艺术是直觉和表现的理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意志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和本体论诗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及弗洛伊德、荣格等无意识心理学在文学艺术上的诠释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诗学思想等。

在文学艺术上，19世纪末在西方弥漫开来的文化的“颓废”气息预示着文学艺术的一场现代变革，“颓废”的根源在于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基本信仰的动摇。诞生于法国的象征主义这朵“恶之花”^[1]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至英美，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主义、以法国为中心的超现实主义、以英国为中心的意识流文学等相继涌现并汇合成声势浩大的现代派文学潮流。二战之后，存在主义文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盛一时，相继又出现了荒诞派戏剧、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文学艺术派别。这些流派在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颠覆古典原则，注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细微，将人生的荒诞无奈、生存的危机和焦虑以及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异化图景以反传统、反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这当中，哲学与诗两大人文领域紧密结合，形成了空前会通的局面。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一是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原有学科之间一直以来相对清晰的边缘变得模糊，相互渗透、错杂和融合开始形成大规模的趋向。哲学在传统命题之外频繁出现文学艺术内容，文学理论与哲学的联系更加紧密，而文学主题的哲学化也更加明显。二是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相互影响、吸收和借鉴。哲学开始向文学和其他艺术类别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或思想的灵感，文学则更加紧密地在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进行创作。三是一些哲学家开始在其著述中花费大量篇幅论述文学艺术问题。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思想转向的海德格尔放弃了《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发表了《艺术作品的本源》甚至进入专业文学史家的研究领域，讨论具体的诗歌问题。一些哲学家以一种类似诗的方式，至少是难以称为哲学的方式

进行著述。柏格森不仅常常在其哲学中对艺术问题发表精妙见解，甚至这种对艺术的爱好也一再表现于哲学行文中，这使他的哲学著作具有散文般的魅力^[2]。尼采的哲学以文采著称，他有意避开经院哲学的模式而采用一种箴言式、“断片”式的表达方式。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把哲学与一种古老的异教的神秘与瑰丽结合起来。这些哲学家被时人称为“诗人哲学家”，其哲学被称为“诗化哲学”。而同时，艺术家们却在以艺术的方式关注理论问题。事实上，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几乎从没有离开过哲理探索的主题，对生命和世界的忧思使艺术家们总是在作品中贯穿着一种哲学思考。有时他们的作品便直接成为某种哲学思想的印证，如表现主义艺术之于克罗齐的直觉理论，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之于存在主义哲学等。有些作家甚至直接进入哲学领域，如萨特、加缪等。这样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

西方现代哲学与文学艺术的融合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这种思潮是以反理性、反传统的方式出现的。一向尊崇理性和思辨的哲学却转而向自身的这种特性发起猛烈攻击，对理性传统和形而上学的质疑与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主要议题，新兴思想正试图推翻旧的价值体系，“上帝死了”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的口号。在这当中，哲学与诗紧密携手，面对共同的对手。我们注意到，哲学与诗之间在这场联手运动中并非是平衡的，一向位于学科之冠的哲学对文学艺术元素的大量吸收利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种反理性的且张扬直觉、感性、潜意识等非理性的思想渐渐形成潮流，而直觉、感性、对人的内心的挖掘和表现正是文学艺术的特有表现手段。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更是将这种“文学的特性”推向文学表现方式的前沿，大量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潜意识、梦境、非理性的作品涌现出来，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派文学景观。其次，哲学的这种“诗性的”的反叛又几乎总是与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和探究结合在一起。这种哲学思潮几乎无一例外都以关切人生、追寻人生意义为己任，将哲学中悲天悯人的性质充分发扬。我们一般将这类哲学称为“生命哲学”，或划归人本主义哲学范畴。有趣的是，反之，持有人本主义基本立场的哲学又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有着反理性、反形而上学的倾向。

哲学为什么要与诗融合发生诗化的现象呢？哲学要向诗中寻求什么，而诗又在其中担当着怎样的角色？

二

欧洲思想传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相信世界存在着合乎逻辑的秩序，并且这种秩序可以为人的理智所认识。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崇尚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尽管古希腊人早已有对神话和逻各斯的区分，但是对理性的尊崇和对非理性的抗拒应该说是西方文化一直以来的主导传统。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种观念两千年来一直深深浸透西方文化的精神，成为西方文化基础的、主导性的思想，西方思想史以及全部现代科学都建立在这种理性的基础上。作为思想的王者，哲学是统摄各思想领域、各学科的总领性学科，理性、思辨、逻辑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探究纷繁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哲学的基本任务。这种观念也渗透到人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理性至上的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最终成为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基础性观念。第一阶段是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人性的觉醒时期。人性要求从神学权威下解放出来，获得人的尊严和独立。而人的觉醒一方面是对自然人性的肯定，对世俗生活和世俗情感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人的智慧和理性的肯定。人意识到可以通过理智来思考和决定自身的命运，而不是依靠上帝来判断世界。文艺复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理性的全面觉醒时代。在此阶段，文学艺术扮演了非凡重要的角色。第二阶段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推波助澜。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成果开启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增强了人们对人类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则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是启蒙学者的共同理想，理性的基本立场成为哲学的基本立场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论。笛卡尔认为，一切公认的传统观念都必须以理性来衡量。伏尔泰说：“上帝赋予了我们一条普遍性的原则……这条原则是如此牢固，

以致虽有激情挑战它，虽有暴君企图在血腥中倾覆它，虽有江湖骗子想通过迷信毁掉他，它独岿然不动。”^[3] 这是一个充满理性的激情的时代，也是全面认识世界的时代，它造就了一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些人中不少本身亦是哲人，亦是造诣颇高的作家。第三阶段则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和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成功进一步证实了“天赋人权”的观念。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理性主义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产生了新的更为强大的思想力量，造就了理性的新神话。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思想领域，这使人们对人类理智有了更强大的自信，人们相信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把握和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一个理性的膨胀时期。

这种推崇理性的直接结果是“非理性”的被贬抑。“非理性”在西方文化的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哲学中会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述：它可以被称为感性、情感、直觉等，它是形象的，也常常是表象的、具体的，它是非秩序、非逻辑的，也是非本质的、不科学的，总而言之是相对低于理性的。除此之外，理性主义又总是和这样一些东西联系在一起：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逻辑、科学、认识论的方法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秩序和中心主义等。这些西方文化中最基本的观念促成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也带来种种问题。

与此同时，对理性主义的怀疑也一直伴随着理性主义推进的全过程。古希腊早期的伊壁鸠鲁学派、赫拉克利特以及怀疑论者已经发出了另外的声音。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将思维区分为几何学精神和敏感性精神，将几何学的逻辑推理方式与心灵的直觉的感悟的方式区分开来。康德并不反对理性和科学，但他认识到科学理性只能解决现象界问题，并不能解决诸如信仰、道德等终极问题。他第一次让艺术成为连接信仰与现象界的通道。这种倾向至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是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第一次轰轰烈烈的联合运动。

浪漫主义作为文学艺术思潮绝不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浪漫主义运动肇始于德国，并在德国形成了浪漫主义的系统理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是浪漫主义哲学、诗学和文学创作合力形成的思想运动。浪漫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针对启蒙主义的理性神话，尽管启蒙主义者对理性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理性王国”并没有如预言的那样实现，启蒙学者所期许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在现实中破灭。浪漫主义者对这种自信的理性主义和进步的科学观充满了忧虑，他们认为，只有诗性的精神才代表了自然和宇宙的本体。谢林认为整个宇宙本身就是诗，施莱尔马赫主张美与宗教是合为一体的。弗·施勒格尔则强调生命本是诗意的存在：“在我们心中生活着诗人的一部分，闪烁着他的创造精神的一个火花，在我们自己造成的非理性燃烧后的灰烬深处，诗人及其精神的火花一直在悄悄地鼓足力量燃烧，永不熄灭。”^[4] 他认为，诗也将促进思想与人性的统一和谐，“一切艺术和科学的内在的神秘意蕴乃是诗的财产。一切都是出自这里，一切也必将回归这里。在人性的理想状态中，只会有诗存在……”。^[5] 浪漫主义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诗之于反理性的特殊性质，意识到诗在哲学天命中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他们来说，诗已不是一般的艺术形式，而是人类精神的守护使者，负有传达来自神的旨意的特殊使命。因为诗在人类命运中的这种特殊作用，哲学无法抛开诗的陪伴。

哲学与诗的融合运动恰好发生于理性主义发展最为充分，同时也是暴露出的问题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剧了欧洲世界的文明幻灭感，曾经使欧洲人引以为骄傲的理性主义在瞬间变成集体的疯狂和对生命尊严的践踏，欧洲文明所赖以支撑的信仰受到空前怀疑。进入20世纪，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巨型工厂，人的心灵价值和本真性越来越受到来自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的侵蚀。人的主体地位加速膨胀，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能源危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物种濒危，核战争危险，文化和意识形态争端等等，理性主义的危险似乎已经从战争的灾难逼近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人们不仅正在失去地球的家園，也正在丧失着心灵的家園。伽达默尔认为“近代史中科学与哲学之间古老的对峙也许在本世纪达到了顶峰。”他追问道：“以前的哲学在当今生活的整体

中是否还有一席之地”^[6]

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也为哲学提供了更加开阔的理论背景，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等都对当时的思想和艺术发生了强烈冲击。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议题。理性主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否定，这又进一步促成了反理性浪潮的生成。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相信，纯粹概念性的思考无法传达事物最幽微的本质，它只能解决生命的表象，而生命的本质却逃避纯粹的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说：“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答，人生的问题仍然毫未触及。”^[7] 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异，把理性从“生命”的范畴中分离出来。柏格森区分了理性的、概念化的思维和直觉性的理解，前者是实用的工具性思维，针对实用知识的层面，但并不能产生真理，因为真理是不能如此被划分和计算的。而艺术是一种直觉，艺术家以直觉超越理性，在最高的境界上纳万物为一体。尼采从论证古希腊悲剧开始，他认为，与其说古希腊精神的主旨是理性主义，不如说是非理性的酒神式的激情，这种激情来源于原始的生命力量，与阿波罗式的理性调和出不朽的艺术。海德格尔将美视为存在的真理的显现，伟大的艺术作品因为将天地神人汇聚在一起展现了人的生存而揭示了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西方哲学已经终结，人们应该倾听诗人的声音，而最需要倾听诗人吟咏的就是哲学家，哲学家们必须“冷静地运思，在他的诗所道说的东西中去经验那未曾说出的东西，这将是而且就是唯一的急迫之事”^[8]。当哲学在现代陷入人生问题的困境时，哲学家们却在艺术中发现了通往真理的途径，哲学所不能承担的任务要通过诗来实现。这些哲学家们认为，在人类精神活动中，还存在着一个不同于科学认知的领域，这个领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即一种非理性的、感性的、直觉的、无意识的方式关照着世界。而生命意义问题、心灵问题以及宗教等终极问题不能以科学理性的认知方式来获得，而要靠一种领悟的、诗性的、审美的方式来获得。这些理论也反过来促成了当时文学艺术将自身的触角伸展到人类思维更为深远、更为细微之处。从理性到艺术感性，从本质到表象以及艺术形象、意象、情境，从先验概念到活色生香的生活世界，从逻辑分析到情感的体验、感动、想象，从理性世界到审美之境，直至人类思想中原始幽深之处，直至意识之下混沌的世界、意识的流动，在这个过程中，一种诗性的、审美的精神已渐渐浸入哲学严肃的世界。

三

哲学与诗融合、向诗学习的意义在于：首先，哲学再次对诗和诗性有了更深刻的发现和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与对“非理性”的认识和宣扬结合起来的。

考察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哲学与诗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乃至争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各自的发展。在古希腊人关于神话与逻辑的隐约分辨中，人们发现了哲学与诗的最初纷争。最著名的例子便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以诗人是在一种癫狂状态下创作，并且不能对理念进行完美模仿为由将诗人驱逐出去，甚至连荷马也不能幸免。但是，柏拉图在其哲学中却一再谈到诗、诗人以及美的本质，并一再援引荷马史诗和悲剧的例子作为哲学思辨的材料。人们甚至认为，尽管柏拉图对诗的态度如此，但他似乎又在“暗示诗——它明显已经被逐出城邦，实际上应该支配哲学。”^[9] 同样，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也并没有忘记给诗学留下位置，而他对诗的理解和规定则影响了西方两千年的文学观念。同时，这种哲学家对诗的自发关注、理解和研究的传统也延续下来，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两种特质：一是形成了西方诗学的特质，即哲学对文学艺术主动介入，哲学家以哲学立场来阐释诗学问题，形成了基于哲学立场的诗学、美学；二是形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特质，即哲学中的诗性成分，西方哲学家在构筑和阐释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大多将对文学艺术的论述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哲学体系的一部分。这种对文学艺术的关注和主动参与精神一直贯穿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也因此形成了西方文化中介于哲学与纯文学艺术之间专门研究文学艺术和人类审美现象的领域。

进入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伴随着理性的“破产”和对理性认识的深入，人们对“非理性”、对“诗性”又有了新的认识。人们意识到，非理性并非是一种混乱、消极、可怕的东西，毋宁说它是位于人类思想的根源性的东西。弗洛伊德把它比喻为潜藏于水下的巨大冰山。柏格森认为人的意识才是唯一可靠的，生命不是来自认识而是来自体验。维特根斯坦则将逻辑无法把捉的东西称为“神秘”：“诚然有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10] 哲学家们开始发现“非理性”的意义和力量，同时也注意到诗与“非理性”的深刻关联。继康德之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将审美与哲学终极问题结合起来。谢林认为：“艺术是哲学的唯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这个证书总是不断重新确证哲学无法从外部表示的东西，即行动和创造中的无意识事物及其与有意识事物的原始同一性。正因为如此，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象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11] 尼采认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12]。在面对永恒的生命奥秘时，哲学家们都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文学艺术，将诗视为关乎生命的本真性质的东西。一些哲学家把诗上升为本体论，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工具理性和哲学思辨都无法回答我们的生存问题，而诗却可以揭示生存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一切诗意的创造活动以及一切与诗意的创造性活动有关的事物都可以称为诗，伟大的艺术带有诗意的全部深刻内涵，人通过伟大的艺术作品来领悟存在的秘密，而人生的真正意义便在于领悟人之为人的真谛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生存便是一种本真的生存。在这里，诗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已不单纯是一种文学活动，诗是真理的显现方式，是关乎人类生存意义的创造活动，诗意的就是人性中最纯真的东西，是摆脱了一切思维和有限性的枷锁的思想和生存的最高之境。对诗的这种发现使诗受到哲学家们的特殊推崇，哲学家们意识到诗在思考 and 解决人生问题中具有重要意义，诗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通常的文学艺术范畴而成为理解生命意义的必经之途，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对抗形而上学、反对现代性、反对科技理性的思想武器。

其次，哲学与诗的融合既是诗对哲学的一种修正，也是西方文化对自身的一种反省和修正，是诗对哲学的平衡。长期以来，由于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以及哲学的特殊地位，哲学与诗之间在思想上的输入与输出并不是平衡的，哲学向诗学习要远远小于诗对于哲学的依赖。艺术作品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反映某种观念，这些观念来自艺术家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艺术作品尽管可以做到美仑美奂，但充其量只是对理念的一种并不高明的摹仿。这种“摹仿论”、“镜子说”的思想早已成为西方诗学传统。因此，当哲学家提出诗在人类思想史中具有堪比哲学的特殊意义，甚至当哲学面临不能解决的困境而要求助于诗的时候，就不能不令人称奇。但是，细究起来，所谓哲学的困境，其实应是西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困境，哲学向诗学习的过程，应是哲学摆脱困境、自我修正的过程。哲学向诗学习的动力来自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种内在的转变需求是促成哲学向诗学习、与诗融合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正是哲学自身的反思和自我修正使得哲学开始向诗、向哲学以外的领域寻找思想的新路径。因此，哲学对诗的推崇和学习，既非屈尊俯就，也非言过其实，而恰恰说明了人类思想蓬勃向前、海纳百川的生命力。

通常情况下，哲学以思辨、理性、抽象为特质，而文学艺术则以想象、形象、情感为特质，这两种文化领域是朝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在一些重要的特质上，哲学与诗是以相互对立的两极形式出现的。西方哲学的历史是一部以理性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因此尤其强调这种理性思维。但是，如前所述，理性不断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理性不断蜕变的历史，理性的正面效应在不断被放大的同时，负面效应也随之显露出来。人们认识到，最本质的东西不能靠主体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认知活动来把握，也不能以理性的计算之思来衡量，而必须以“领悟”，即以种类似诗性的、整体的、非概念性的、模糊的思维方式来领悟。而哲学向诗学习、借鉴、融合的过程正是哲学以诗性的思维对自身理性的思维的自觉修正过程。狄尔泰区分了科学认识和生活世界的认识的不同，他认为对生活世界的认识以询问意义为目的，需要以领会、解释和体验的方式而非科学方式。但是，普遍的理性化使人的心灵丧失了灵性，

忘却了感性的生存。狄尔泰提出了“生命哲学”的观念。他认为，哲学家们总是在试图建立一个宏伟的宇宙体系，沉湎于形而上学的概念中，却因此忘却了哲学应以追寻生命的意义为天命，而在这一点上，诗却一直在守护着人生的命题。在这种时候，需要诗人出来取代哲学家，承担起被哲学家遗忘了的追思生命意义的责任。以诗人的思考方式来解决人生问题，在狄尔泰看来是当今哲学的方向，这必将会促进新的哲学的产生。

这种修正也是哲学与诗联手对文化进行的修正。西方文化在20世纪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迫使思想家和艺术家们对此思考和采取措施。海德格尔把西方的这一历史时期称为“逃遁了的诸神和正在到来的神的时代”^[13]，诸神离人远去而新神尚未到来，世界之夜将达夜半。但是，他又援引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赎。”许多哲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文学艺术，希望通过诗性来纠正整个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和理性思维的偏颇。弗·施勒格尔说：“哲学在哪里终结，诗就必然在哪里开始。”^[14]哲学家希图通过文学艺术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丧失了人的本真性、失去了对世界的亲近关系、迷失了精神家园的人们回到自身的心性中，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哲学家一再强调文学艺术所独有的审美性可以改造社会、救赎人心。卡西尔说：“这些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无法以抽象的概念去掌握，但是却以一些从未被认识的崭新的事物的启示之形式呈现于吾人面前。艺术的一种最大的成就乃是：艺术能够自最特殊之处感受到和认识到那客观普遍的，而自另一方面说，艺术又复能够把它的所有客观内容具体地和特殊地展示于吾人面前，并以最强烈最壮阔的生命去浸润这些客观内容。”^[15]

可见，哲学对诗性的强调具有深刻的意义。对诗性的强调、对一切精神领域中的审美性质的强调不仅是对哲学与诗以及对人类其他思想领域的内在融通性的揭示，也是对人类思维过程的一种修正和调整。偏理性、偏逻辑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来自诗性的思维的补充和平衡，同时，这种诗性的精神又被引导到人类生活实践中，成为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也是对以往人们对生命问题的认识的进一步阐释和修正。诗的思维与哲学的思维，通过表面上看来是对立的两极运动而实现了在人类思维上的一种制衡。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理性思维由于其发展的单向度而导致了思维的偏颇，从而导致了人类活动的一些偏颇，而诗性（不等同于非理性、感性）的思维正好可以纠正、调节这种偏颇，使思维向一种趋于中和的方向发展。

最后，哲学与诗的融合进一步深化和密切了双方关系。哲学与诗的联系集中在人本哲学，并非哲学的全部（同一时期亦有实证主义哲学思潮）。这股哲学思潮将哲学与诗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哲学与诗之间的关系也前所未有地如此紧密。这种现象道出一个问题，哲学与诗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当我们关注哲学或诗的时候，我们通常注意的只是哲学本身或诗本身，这说明我们通常情况下注意到的是哲学与诗之间的差异，但事实上，哲学与诗之间从人类文化一开始就已经紧密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人类文明之初，思诗本是同源，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并未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分工明确。哲学与诗往往不分彼此，如果以今天的学科划分标准衡量，则很难称之为纯哲学或纯文学。这种跨学科的包容性恰恰反映了人类早期思维中的中和倾向。例如《荷马史诗》就被当做哲学来阅读，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人们则以箴言的方式写作。弗·施勒格尔认为“希腊戏剧诗最重要的源头和范型、诗同哲学的相互交融，都可以在古代文化的这段黄金时代中找到……哲学讨论及对讨论的描述都完全步入了诗的领地。”^[16]类似情形也出现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中。《诗经》被作为政治、外交和其他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引证，可以“兴观群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经》在当时绝不只是被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接受的。而诸子百家中的不少典章也同时是今天文学教科书中的经典。这种现象在许多民族早期历史中都存在过。但是，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日趋专业化、精密化，学科之间的分工也日趋精确。分工精细一方面使得思想研究领域趋于精密和深入，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的通融性却反而越来越有限，相互联系越来越松散，学科之间对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重心日趋疏离。而哲学与诗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分歧和差异也变得越来越

越大，以至于人们更多地看到两者的差异和分歧，而忽略了两者的内在的相通性。

哲学与诗都是人类文化的根基性的东西，共同构成人类文化思想的主体部分。文化的特质究其根本在于思想和精神层面，而哲学与诗都是构成这种特质的基本成分。对天地宇宙、人生世事的探索、追问和思考构成了最初的哲学意识，而以语言文字为方式，以感性的形象和丰富的情感来感动人心，表达人对世界的理解、对生活的体认则构成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元素。哲学与诗的联手，源于其天然相连的同根性：究其根本是人对于自身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思想。正是这种关乎人、关乎生命的意识使哲学与诗息息相通。对人类命运的忧思、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反省、对文化的深层思考是哲学与诗融合的基础。这是它们共同的母题。这一人类的大母题使得两者紧密相联。因此，尽管哲学与诗在思维上的不同取向、不同发展路径、不同关注点和不同方法使得人们在面对世界时采取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血脉相连的特质，这种共同的根性却使得哲学与诗有可能联合起来对社会人生进行思考和表达。诗人艾略特说，诗与哲学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诗与思（Dichten und Denken），两者相互需要，就其极端情况而言，两者一向以它们的方式处于近邻关系中。”^[17]历史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德尔斐神庙上镌刻的话“认识你自己”是哲学的最初宣示，同样，“文学即人学”也是文学对自身的勉励。

其实，不仅生存的本质在根本上具有诗意，思想活动本身，包括哲学思维本身也并不像传统公认的那样是一种高度纯粹的理性化、逻辑化思维，而是从根本上包涵着一种诗性的精神。杜夫海纳说：“在人类经历和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能找出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径。原因是：它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点上。”^[18]谢林说：“……哲学就象在科学的童年时期，从诗中诞生，从诗中得到滋养一样，与所有那些通过哲学而臻于完善的科学一样，在它们完成以后，犹如百川汇海，又流回它们曾经由之发源的诗的大海洋里。”^[19]

四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哲学的诗化或诗学的哲学化，处于“真正的”文艺学、美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既与以审美为目的的美学有所区别，也不等同于专门研究文学艺术规律的文艺学。这种诗化的哲学基于哲学立场，是从哲学角度来研究艺术问题，其目的是通过诗来阐述哲学思想，通过揭示诗的本质、诗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语言、美等问题来思考哲学命题。通常情况下，它不把对文学艺术的一般技术性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它不同于通常的文艺学。文学文本、结构、主题、情节、语言等直接关乎一部艺术作品的优劣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在哲学家看来与他们所要表达的对诗的理解关系不大，即使涉及到其中的技术性问题，也是为总体理论服务，而不会专门讨论技术问题。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的创造性活动所具有的特殊规律，在哲学家那里不是研究的重心。他们所关心的是，艺术的本质、美的本质一定与这个世界的本质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的联系。哲学家所关心、所要询问的是世界的本质，他们要寻求本质之道。相反，在那些以科学实证为主要特点的哲学或文论思潮中，艺术的技术性问题、语言的技术性问题往往成为研究的重心。

另外，诗性与“非理性”并非等同。“非理性”一般作为与理性相对的概念来使用，而诗性则包含更多的内涵。“诗”不是狭义上的一种文学形式，甚至也不仅是对文学艺术的一种宽泛的通称，“诗性”不是通常在人们心目中被定式为诗情画意的东西，或一种浪漫的、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哲学家们所推崇的诗性包涵着远为深刻和复杂的内涵。诗性既有“非理性”的成分，如与抽象的、逻辑的、认识论的、概念的、分析式思维相对的性质，同时也包含着艺术的特质，因而诗性本身包含着审美特征。同时诗性作为一种带有人生情境的表述方式，也蕴含着一种人生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因此，在发生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这股哲学与诗融合的浪潮中，笔者更倾向于使用诗性而不是“非理性”这样较为偏狭的

表述方式。因为，在这场反理性的浪潮中，哲学家与诗人们所用以反对形而上学理性的思想武器绝不不仅是非理性，毋宁说他们发现了非理性的价值。哲学家和艺术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文学艺术为武器，与其说他们在文学艺术中发现了非理性，毋宁说发现了诗性这种通向追寻生命本真意义之途的重要元素。诗性不仅包含着与理性相对的一些成分，更因其本身的审美特性而将人生问题由理性认识层面上升到审美之维。思想家们发现，审美的境界、诗性的思维因其整体性的、模糊的、感性的思维方式，因其非功利、非现实的发生方式，因其对于人的心灵的特殊作用，而在如生命、信仰、道德、宗教等精神层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对于重新思考理性在人生社会中的地位，对于匡正西方长期以来偏重理性从而导致现代社会中理性过度膨胀而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正是哲学向诗学习的原因。

理性与诗性的差异不仅在于一个是关于思想和真理，而另一个是关于艺术和美的，对理性与诗性的区分也不在于我们究竟是要以理性的还是诗性的方式看待世界，我们应该看到理性与诗性（哲学与诗）在何种意义上显示差异又在何种意义上趋于融合。正如有西方学者发出的疑问：“哲学究竟与艺术密切到何种程度而又不失掉自身身份呢？艺术能够做到哲学本身做不到的事情吗？或者哲学能够做到艺术本身所做不到的事情吗？”^[20]诗性不仅仅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不仅仅与美有关，同样，如果把一种思想放之四海，树为一种榜样，就会使之演变为一种僵硬的模式，这两者都是偏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哲学与诗的融合局面，是因为西方哲人们意识到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在生命意义上的“失语”，因此，为理性与生命划界是正确理解和运用理性与诗性的前提。理性与诗性在对立中统一，在差异中融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必然的趋势。

也许我们难以想象这种对理性的抗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中和的倾向。中庸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智慧。伴随着哲学的诗化浪潮，更多西方思想家、艺术家开始关注东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其中对思维的借鉴是一个重要因素。思维方式往往决定了文化的不同特质和形态。与此形成比照的是，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武力、经济和文化的冲击，这使得国人不得不开始反省自身文化，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西学东进浪潮，开始了现代化历程。中国近代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是一个痛苦的文化反省、毁弃、蜕变、重生的历程。这种文化的相互冲撞和借鉴也同时说明，人类思想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任何一种试图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于思想来说都可能造成偏差。

注 释

[1]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76)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其诗集《恶之花》(1857)具有标志性意义。

现代主义文学作为文学潮流一般认为应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象征主义。

[2] 柏格森于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3] [美]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4] [5] [14] [16] [德]弗·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第197页；第112页；第177页。

[6]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7] [10] [英]维特根斯坦：《名理论（逻辑哲学论）》，张申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8页；第88页。

[8]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第278页。

[9] [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晖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1] [19] [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2页；第152页。

[12]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第2页。

[13]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2页。

[15] [德]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之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17]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1页。

[18] [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页。

[20] Philosophical Romanticism Edited by Nikolas Kompridis Routledge London 2006 p. 11.

(责任编辑 徐亚莉)